

書

品

中華書局·SHUPIN

一九九四年合訂本

● 李一氓同志與《古逸叢書三編》

冀淑英

● 葉聖陶和《永樂大典》

俞筱堯

● 《型世言》標點疑誤錄

傅載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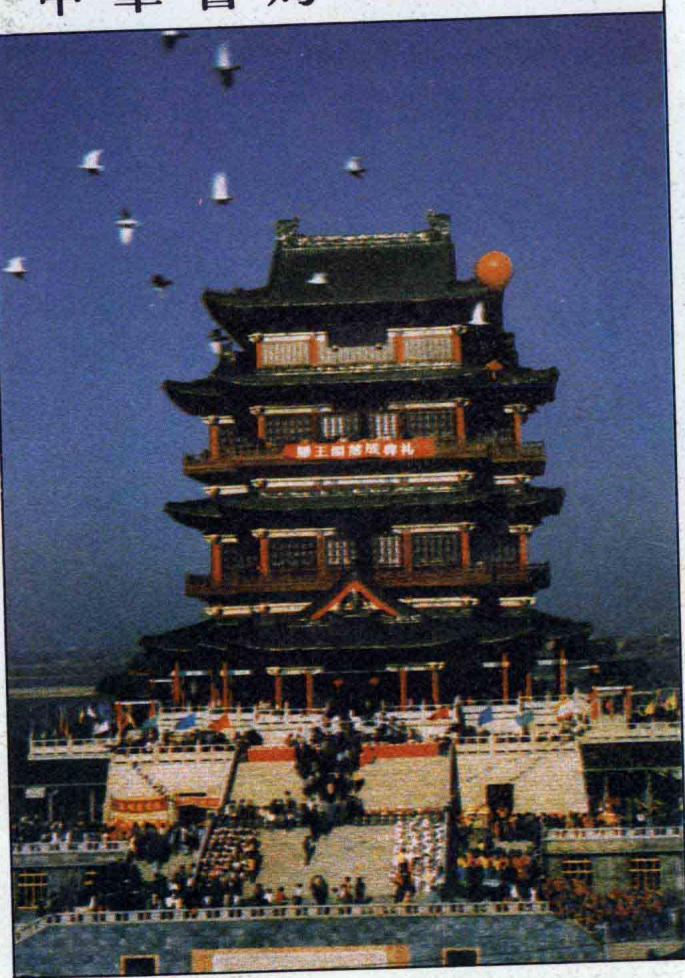
● 評介《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

李少雍

中華書局 · SHUPIN

書品

1994





靜物(油畫)

馬蘭



書品 1994 年第 4 期 1994 年 12 月出版

中華書局總編輯辦公室編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主編 熊國禎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印刷者 北京新興膠印廠

郵購洽購 中華書局讀者服務部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國內統一刊號 CN11—1357 定價: 2.00 元



中華書局出版的《永樂大典》仿制本及綫裝本

書 品 目 錄

1994 年第一期
(總第 33 期)

- | | |
|-----------------------|----------|
| □向讀者致謝 | 本刊編輯部(2) |
| □存亡續絕 嘉惠後學 | |
| ——李一氓同志與《古逸叢書三編》 | 冀淑英(3) |
| □葉聖陶和《永樂大典》 | 俞筱堯(7) |
| □《型世言》標點疑誤錄 | 傅載仁(12) |
| □宏觀與微觀的結合 | |
| ——評介《中國古代神話傳說與古小說》 | 李少雍(23) |
| □《懷古錄校注》評介 | 徐俊(30) |
| □文學革命首舉義旗之急先鋒 | |
| ——評《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 | 李國彤(36) |
| □寫在《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出版之後 | 王素(43) |
| □《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的幾個特點 | 李占領(48) |
| □舒新城的氣度 | |
| ——讀《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迹》隨筆 | 韓石山(54) |
| □談天津圖書館皮藏的古籍錢裝書 | 李國慶(56) |
| □古籍小常識 古籍的印章 | 崔文印(61) |

向讀者致謝

《書品》至今已辦了八年了，八年來，世事變化之大，真讓人有白雲蒼狗之嘆。然而，《書品》這本小小的刊物在各種“大潮”的潮起潮落之中能夠生存下來，這首先要感謝我們的讀者，一是感謝他們破費訂閱刊物；二是承蒙他們賜稿，並費心關注刊物。前不久，任繼愈先生賜信，指出刊物排字有“尸、屍、后、後”之誤。任先生學術工作繁重，仍在百忙之中細細閱讀《書品》並來信指出疏誤，可見先生對《書品》的關愛之深。正因為有這樣許許多多的前輩學者的扶植，許許多多同行學人的支持，許許多多讀者的厚愛，《書品》才能得以生存發展，我們對他們的感激之情實在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正當編輯這期《書品》時，傳來中華書局五種圖書獲獎的好消息：《甲骨文合集》獲國家圖書獎榮譽獎，《永樂大典》、《大唐西域記校注》、《管錐編》獲國家圖書獎，《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這是中華書局全體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中華書局一貫堅持高品位、高質量的出版方針的必然回報。不言而喻，今後，中華書局將一如既往地堅持既定的出版方針，堅持優質高效，着重抓好質量效益，同時調整圖書結構，改善生產經營，努力實現文化品位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結合。《書品》作為以評論、介紹中華版圖書為主要內容的刊物、了解中華版圖書的窗口，也還將繼續為提高中華版圖書的質量、活躍學術氣氛起到促進作用。所以，《書品》十分希望讀者來信來稿，對中華版圖書品評議論，不吝賜教。

《書品》的讀者理應是《書品》高明的作者，也是《書品》的同好、摯友。今後還希望讀者諸君多多支持，多多批評，多多來稿。

《書品》編輯部

存亡續絕 嘉惠後學

李一氓同志與《古逸叢書三編》

冀叔英

李一氓同志是一位革命老前輩，為革命做出了很多貢獻，在學術文化戰線上，他同樣是一位卓越的指揮員。1981年國務院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工作，到1990年，李老在主持這項工作的九年中，為收集整理出版古籍，傾注了大量心血，對保護和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發揮了重大作用。選編影印《古逸叢書三編》就是在李老的倡議和具體指導下，才得以問世的鉅製之一。1982年3月古籍小組舉行全體會議時，李老提議，考慮在黎庶昌《古逸叢書》和商務《續古逸叢書》之後，選印《古逸叢書三編》，把傳世罕見的宋元古籍選編進去，使前人不可得見的孤本得以普及，為古籍校釋和學術研究提供有益的資料。會後李老徵集一部分同志意見，醞釀擬就一份《古逸叢書三編》簡目，當年五月約請幾位同志就影印《三編》研究交換意見，事情就這樣落實了。現在《三編》陸續影印出版了四十三種，其中絕大部分是傳世僅存的孤本，還有的書是成書後最早的刻本，以及我國藏書史上流傳有自，並世無兩的珍本。

《三編》選印各書的着眼點，是很具特色的，一是選書標準既重視版本價值，同時顧到學術價值和資料價值。二是只要屬於孤本秘籍，不計書之全或不全。如經部書選印了南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六經”中的《禮記》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據宋黃震《黃氏日抄》咸淳九年修撫州六經跋，宋時撫州刻有六經三傳，至咸淳時又添刻論、孟、孝經，以足十二經之數。《禮記》一書，卷末有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書銜名七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版式、字體、刻工與《禮記》並同，可知為同時官版。今傳世撫州本諸經，全帙只此二部，尚有《周易》、《春秋經傳集解》殘帙存世。撫州本《禮記》為海源閣楊氏“四經四史之齋”舊藏宋本四經之一。再有浙東茶鹽司刻本五經，傳

世全帙有三種，即《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和《禮記正義》。茶鹽司刻本諸經，始將經文、注、疏合刻於一本，是宋代經、注、疏合刻的第一版，因刻於紹興，世稱“越州本”，又稱“八行注疏本”。《禮記正義》有紹熙三年黃唐跋，稱“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即指此本。黃唐任職浙東茶鹽司前，茶鹽司先有舊刻易、書、周禮三經，黃唐又取毛詩、禮記二經刻之。《毛詩》、《周禮》二經久佚，《禮記正義》有1927年潘氏寶禮堂影刻本，《三編》選印了《周易注疏》和《尚書正義》。這些在傳統文化的經書中都是珍貴的資料。

《三編》還選印了一批出色的既富資料價值又具版本性質的書，其中首推宋刻《金石錄》。宋洪邁《容齋四筆》云：“趙德甫《金石錄》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作後序，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這一刻本經歷宋、元、明幾朝，一直隱晦不爲人所知，元、明兩代近四百年不見重刊，明代所傳全屬抄本，至清順治間始有謝世箕刻本，謝本舛誤較多，未足爲人重視，乾隆時盧見曾刻本《金石錄》，遂爲清代通行之本。建國之初，宋刻《金石錄》出現於南京，轟動一時，書中刻工有的見於淳熙舒州公使庫刻本《大易粹言》，宋諱缺筆至慎字，無易安後序，與《容齋四筆》所記相符，可推知此即淳熙前後龍舒（今安徽舒城）郡齋刻本。此書字體勁秀，筆畫嚴整，堪稱宋代安徽刻書之標本。《建康實錄》是記六朝事迹的史部資料之書，此書卷末有嘉祐三年江寧府校正官張庖民等銜名七行，紹興十八年荆湖北路重雕校勘官韓畛等銜名九行，因知此書爲紹興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撫使司重刻北宋嘉祐本。這是此書傳世最古的刻本。《大唐六典》是唐代官修記述當時職官制度的專著，書中所定制度、規程當時雖未完全實行，而唐人議論典章、儀制時，每加引用。書中卷末有紹興四年知溫州永嘉縣主管勸農公事詹械刻書跋，又有溫州州學教授張希亮校正銜名一行，知爲紹興四年溫州州學刻本。此書書版宋時取入國子監，元時版送西湖書院，《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有《唐六典》一目，蓋即此本。原書中有元代“國子監崇文閣官書”楷字朱文大印，知系元代官書，入明歸于內府，清代藏內閣大庫，清末民初之際，由內閣大庫散出。此本今存十五卷，約當全書之

半，碩果僅存，猶存蝴蝶裝舊式。《唐六典》一書，明代有正德十年席書、李承勛刻本及嘉靖浙江按察司刻本，兩明本脫文、訛奪處甚多，可賴此本補缺誤正。還有《忘憂清樂集》的宋刻本，編入《三編》為第一部，是現存最早的圍棋譜，宋代以前的圍棋資料賴此得以保存，對研究中國圍棋史和棋藝有重要意義。此書影印問世，在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響，對促進中日棋藝交流，起了不可輕估的作用。此書清初為錢曾所得，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題作《李逸民棋譜》，清中葉書歸黃丕烈，顧千里為黃氏藏書所作《百宋一廬賦》中“忘憂清樂”句，即指此書，其書後歸瞿氏鐵琴銅劍樓。

《三編》中有一部分是原書成書後的初次刻本，和傳世最古的刻本，值得重視。如程大昌的《禹貢論》附《山川地理圖》，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學刻本。淳熙七年程大昌出守泉州，泉州市舶彭椿年從大昌得此書副本，囑州學教授陳應行刻之郡庠。卷末有淳熙八年陳應行刻書跋文並校勘官銜名四行，是成書後第一刻本。此書版刻精好，紙墨瑩潤，乃宋代福建刻書中精品。蔡沈的《書集傳》，書名作《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宋淳祐十年上饒郡學刻本。卷後有“淳祐庚戌季秋金華後學呂遇龍校正刊于上饒郡學之極高明”二行，知為淳祐十年上饒官板。卷首淳祐十年蔡抗進書表，後有看詳、書傳問答，及黃自然、朱鑑、呂遇龍等跋文，宋以後本俱刪去。此為傳世蔡氏《書集傳》最早刻本，楊氏海源閣舊藏，《楹書隅錄》未著錄。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刻本《山海經傳》，是本書傳世最早刻本，與《文選》同為尤袤所刻，二書刻工多同，宋諱缺筆至慎字。北宋刻本《范文正公集》，亦范集現存最早刻本，字體端重，避諱謹嚴，北宋諱、樹、署、頊等俱缺筆，南宋諱構、溝不避。宋淳熙十四年嚴州郡齋刻本《新刊劔南詩藁》是陸游知嚴州時自刻，是陸詩的最初刻本。

《三編》中還有一些書，不僅以版本價值取重，本身又經名家遞藏，所謂“流傳有自”，頗具文物價值。如《新序》南宋初年杭州刻本，宋諱缺筆至構字，書中刻工皆南宋初杭州地區良工。此書為清初著名藏書家錢謙益舊藏，錢謙益有跋，跋文見錢氏《牧齋有學集》。錢氏藏書處曰絳雲樓，順治初絳雲樓失火，藏書焚毀殆盡，此乃燼餘

幸存之本。此書清中葉歸黃丕烈，《百宋一廬賦》云：“新序經進，年月具官，庚寅焚如，歷劫偏完”，即指此本。庚寅爲順治七年，即謂絳雲樓被火事。宋聶崇義撰《新定三禮圖集注》，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此書淳熙二年陳伯廣後跋稱：“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據嘉定《鎮江志》，宋時府學教授有熊克、陳伯廣、徐端卿等，與陳伯廣後跋相合。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宋史》人文苑傳。印書紙背公文有淳熙五年府學教授徐端卿、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司馬笈銜名。此書宋、元間爲著名學者易學家俞琰藏書，明嘉靖間歸華夏真賞齋，華氏誤認爲北宋本。書中有錢謙益跋，跋文見《有學集》。還有南宋初婺州（浙江金華）刻本《周禮》，此書刻印精美，卷三後有“婺州市門巷唐宅刊”牌記，又有“婺州唐奉議宅”牌記。爲海源閣楊氏“四經四史之齋”舊藏宋本四經之一。

宋、元版書有的刻印極精，直追手寫真蹟，有的保存舊裝，猶存蠅裝原貌，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堪與法書名畫並列。雖然這不是版本的主要價值，但古籍中很多在學術、資料性、版本性質外，兼具版刻藝術價值，應屬於我國雕版印刷史上的傑作。《三編》所印的書，類此者如宋龔昱輯《崑山雜詠》，開禧三年崑山縣齋刻本，寫刻絕精，內容文字亦勝。宋俞松撰《蘭亭續考》，宋淳祐刻本，精湛絕倫。還有元至大刻本郭豫亨的《梅花字字香》，元至正刻本韋珪的《梅花百詠》均以寫刻工緻，紙墨精雅見稱，二書皆楊氏海源閣舊藏，楊紹和稱爲“璧合”，見《楹書隅錄》著錄。在刻印技術上精妙絕倫的書，當然還不止這些，不一一列舉。《三編》選印的書，不僅在學術資料價值上爲前人所罕見，在雕版技術上也堪稱獨步。《三編》的出版使这么多的秘籍幻爲化身，存亡續絕，變孤本爲不孤，嘉惠後學，影響是深遠的。在此，對李老的苦心倡導，從選書到出版，親抓實干的精神，更引發我們深深的懷念。

葉聖陶和《永樂大典》

俞筱堯

說到葉聖陶(1894—1988)和《永樂大典》，且從中華書局 1958 年秋冬籌劃影印《永樂大典》的工作講起。由于時間相隔久遠，記憶難免錯漏，不當之處敬請知情者賜予教正。

《永樂大典》影印緣起

《永樂大典》是我國古代著名的類書，全書 22937 卷，分裝 11095 冊，字數約有 3.7 億，全部楷書手寫，其篇幅之大，工程之浩繁，為世界圖書之最。1860 年英法聯軍和 1900 年八國聯軍侵犯北京時，竟被焚掠殆盡。一部卷帙如此浩大的文化典籍而遭此浩劫，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罕見的。

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焚掠之餘，流散在國外的《永樂大典》殘存本，有一部分後來陸續回到了祖國。散失在國內的，也由國家圖書館進行收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將他們所藏的《永樂大典》先後贈還給了我國，合計 67 冊。《永樂大典》當時主要收藏在北京圖書館。另外，上海和四川等地圖書館也有收藏。中華書局通過各種渠道多方訪查，共得 730 卷。這些殘存的《永樂大典》雖然不足全書的 3%，但仍然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有鑒于此，齊燕銘和金燦然等同志在製訂整理出版古籍的長遠規劃和組織校點二十四史等我國基本古籍的同時，決定將這批失散在各地的《永樂大典》影印出版，便于學術界研究參考。這一設想和印製的方式，曾征求過郭沫若、范文瀾、葉聖陶、吳晗、翦伯贊、尹達、夏鼐、魏建功、趙萬里諸先生的意見。在中華書局，則由陳乃乾、潘達人、陸高誼等負責其事。先后參加工作的還有洪文濤、朱士春等。《永樂大典》系用墨筆楷書抄寫，引用的書名則用朱筆。北京

圖書館搜集的本子有不少是原本，但也有不少是從國外翻拍回來裝訂成冊的陰圖相紙，朱筆書名和正文不易辨識，所以又特地請目錄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王重民到中華書局逐頁逐行辨識後作出標記，印製時能夠將引用的書名恢復為原來的朱色，使影印本款式和原本取得一致。

這項工作在北京、上海兩地進行。當時商務印書館上海辦事處的丁英桂，曾隨出版界前輩張元濟從事影印古籍工作多年，是位影印古籍的專家。為保證《永樂大典》的印製質量，便調到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專門從事這一工作。1959年春，我奉命專程送了一批《永樂大典》陰圖相紙本到上海去，就是丁英桂和主管這一工作的上海編輯所副主任戚銘渠接待和點收的。在上海印製的這批《永樂大典》分連史、毛邊兩種紙張朱墨兩色縮小套印，成12開本202冊，分裝20函，共500套，於1960年出版。

《永樂大典》仿製本

《永樂大典》全書編成後深藏宮苑。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專門成立了“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事處”，輯出佚書近400種。唐人林寶撰《元和姓纂》、宋人薛居正撰《五代史》（即《舊五代史》）、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和南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等著名書籍都久已亡佚，賴《永樂大典》得以保存，可見《永樂大典》之重要價值。據有人統計，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焚掠之後，至今尚殘存在世的《永樂大典》約有800餘卷，中華書局影印精裝本已搜集其99%，當是至今為止最為齊全的影印本。在此以前，國內見到過原書的，在清末除了少數館閣大臣和後來的圖書館管理工作者、收藏家和少數學者外，大多只聞其名而已。因為這個緣故，中華書局在1958年秋冬籌劃影印後，次年8月，齊燕銘提出“我主張用連史、毛邊印成與《永樂大典》同樣的開本，同樣裝訂，讀者可以與《永樂大典》合購，也可單獨購買。請考慮。”於是，中華書局有印製仿製本之議。後由陳乃乾、潘達人和趙萬里等初步選定，經金燦然和齊燕銘等商量後，同意將北京圖書館所藏烏字韻的一冊（卷2345—2347），按照原書款式和裝幀，用宣紙製成仿製本，以便今天

的讀者能夠見到《永樂大典》原書的風貌。這本仿製本在胡道静協助工作下，于 1959 年國慶節前夕出版，中華書局以此書向新中國建國 10 周年獻禮，表示衷心的祝賀和永久的紀念。

《永樂大典》仿製本印了一份單頁的《說明》夾在書內隨書發行。《說明》初稿寫成後，金燦然送請葉老審閱。那些天葉老工作很忙，每天上下午不是開會，便是審改教材，十分疲憊。但他仍舊像批改小學生作文似的逐字逐句進行了審閱和修改，連分段和標點符號也不輕易放過。例如葉老將《說明》初稿第二段和第一段歸併為一段，並將其中“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宗教、文學、醫藥、工技、農藝等，蒐集極為宏富。”修改為：

“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醫藥、工技、農藝等六類，蒐集極為宏富。”

葉老不僅改正了分段不當和標點錯誤，還使《永樂大典》內容分類介紹更加確切具體，文字也更通順了。葉老在“七、八千種”處，特別寫了“此頓號無論如何不能要”。又如第五段：

“我局現根據北京圖書館原本和複製本，又最近向國內外私人藉到的 6 卷，合共 730 卷，正在縮小影印，不久即將出版，以供學術界作科學研究的參考。”

經葉老修改潤飾後，成為：

“我局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原本和複製本縮小影印，最近又向國內外私人藉到 6 卷，合共 730 卷，不久即將出版，以供學術界參考。”

經修改潤飾，改正了邏輯上的混亂，敘述就十分清楚了。這類修改之處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紹。但有一處修改卻是應該特別提出來的。《說明》初稿最後一段有這樣的話：

“這裡單獨選出一冊（卷 2345 至卷 2347），仿原書大小式樣印製，要說明《永樂大典》這一類型的百科全書，這一冊的內容是具有代表性的，讀者從而看到《永樂大典》內容的一斑和裝幀形式。”

葉老將這幾句話修改成爲：

“這裏單獨選印一冊（卷 2345 至 2347），大小式樣，全照原書，讓讀者看到《永樂大典》內容的一斑和裝幀的原來形式。”

修改後，初稿中的“要說明《永樂大典》這一類型的百科全書，這一冊的內容是具有代表性的“這些累贅而又似是而非的說法全都刪去了。在“具有代表性的”一語之下，特別指出：“一冊的內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書的體例和規模，我覺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讀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說法不如刪去。如果必須保留，應該說得明白些，說明從什麼幾點可以見出這一冊的代表性。”《永樂大典》全書兩萬幾千卷，一萬冊以上。卷帙如此浩大，中華書局在搜集殘本影印時，連全書目錄也還沒有見到，怎麼能夠讓讀者從一冊仿製本中見到全書的體例和規模？葉老在讀到這些文字時當然不可能不提出疑問，指出其不當。中華書局起草《說明》初稿的人其實也不見得有這樣以一概全的企圖，無非取其這一冊既有文字，又有插圖，版面較爲豐富多彩，且又是蘇聯贈還的而已。只是“具有代表性”這類記法，平時聽得多，用得更多，已習以爲常，在起草《說明》初稿時也就沒有多加思索，想當然地寫了進去，結果反而弄得語意不明，由此可見寫文章是馬虎不得的。葉老所指出的問題，固然是針對《永樂大典》仿製本的《說明》初稿而言的，但下筆不能馬馬虎虎，要認真思考，顯然不只是一篇《說明》的事。葉老當時已年逾花甲，幾十年來他除了自己寫作，審閱、潤飾和修改他人的稿件不知有多少，他對待工作從來都是這樣認真嚴肅，真正達到了一絲不苟的境地。金燦然看到了葉老的修改稿後，曾一再叮囑我們要認真學習葉老的工作精神，當時中華書局不少人看了葉老的修改稿，也都十分感動。

《永樂大典》精裝本的影印出版

《永樂大典》730 卷影印出版，深受國內外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重視，中華書局在社會各方面的熱情協助下，又從各地陸續收集到若干卷。考古學家夏鼐也曾從英國搜集了幾個膠卷贈送給了中華

書局。十年動亂，這項工作被迫中斷。十年動亂以後，原來策劃和負責過這一工作的齊燕銘、金燦然、陳乃乾、陸高誼、王重民、丁英桂等相繼故世，潘達人也已年老體衰，記憶模糊。1971年冬，中華書局大搬家，從西郊翠微路遷到市中心區王府井，《永樂大典》檔案和其他家具等雜物混在一起用大卡車裝卸，散失在新址樓道里。趙守儼偶然發現，便收存了起來。1974年他將這項工作交給了張忱石。張忱石是位難得的有心人，工作認真細緻，1964年他從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參加中華書局工作。他從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回到北京後，從事《晉書》整理工作，同時對《永樂大典》在原來的基礎上作了廣泛深入的調查和艱苦的搜集。他從日本、德國、韓國、英國、美國等國家搜集了一部分，十年動亂中在上海和山東新發現的幾卷也找到了下落，連同檔案中保存下來的，合計為67卷，另殘頁5頁縮小影印成綫裝20冊，分裝兩函，與1960年的影印本配套，共797卷222冊，22函。1986年，中華書局決定將兩次所印綫裝本，由洪文濤、李湘波和沈谷身等割裱成16開精裝本10冊，影印出版。此次影印的精裝本是目前收集最為齊全的版本。這個版本還收有《連筠簃叢書》刊載的《永樂大典目錄》。但這個目錄有殘缺，在張忱石苦心搜求下，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內府抄本配補，得以齊全。這份目錄不僅對了解《永樂大典》全書內容有很大幫助，並且具有鑒定《永樂大典》各種抄本真偽的重要價值。1992年《永樂大典》精裝影印本榮獲首屆古籍整理特別獎，1994年又榮獲首屆國家圖書獎。

《永樂大典》的搜輯影印成書，曾經經歷了艱難的歲月，又有多少有心人無私地投入了寶貴的心血。中華書局在編輯工作中得到葉老的熱情關懷和幫助很多，為《永樂大典》仿製本審閱修改《說明》初稿，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承《書品》之約草此短文，謹以此表示對前輩的不勝懷念之情。

1994年3月

《型世言》是明末刊行的一部白話世情短篇小說集，雖然作者以講故事作為給社會樹立道德風範的手段，宣傳教化的意圖濃烈而明確，作品仍然取得了相當的藝術成就。所寫多明代人物時事。當代人寫當代事，對矛盾沖突的了解和描繪是相當深入的，具有強烈的時代感。例如對貪贓枉法行賄請托之黑暗的揭露，對科舉考試種種舞弊做法的描繪等，都是淋漓盡致入木三分的。書中不乏曲折生動的故事情節，也塑造了不少性格鮮明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不少故事寓意深刻，而且適應明末政治形勢的需要，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另外，作品口語化程度很高，通俗生動，新穎活潑，有些語言材料和語法現象是明代白話中才有的，在其他書中未曾見到，為近代漢語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型世言》標點疑誤錄

傅載仁

單君點校的《型世言》，為廣大讀者和有關的專業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整理點校工作是認真的，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前言和“《型世言》故事源流”等三個附錄，為人們深入研究這部小說集提供了具體可靠的基本材料和重要線索。這些都是值得稱道的。只是由于時間緊迫，書中尚有若干標點斷句不甚妥當之處，也有失

中華書局迅速出版了
校的錯字，筆者願意獻上一得之愚，供點校者參考。思慮未周，不敢自是，故稱“疑誤錄”。

第20頁回末評前三行

雨侯曰：革除之際，方侍講經文而迂疏無當，齊尚書、黃少卿緯武而速釁寡謀，適足發成祖之蟄，高飛帝畿，齊、黃成祖之功臣、建文君之罪首也。

按，“畿”字下逗號應改句號。此句簡述方、齊、黃三人舉措不當，恰恰促成了朱棣起兵靖難，回南京稱帝。下面是一個判斷句，“齊、黃”二字為主語，其後應加一逗號。“成祖之功臣、建文君之罪

首也”是判斷句的謂語。

第 32 頁末三行回末評

草莽臣曰：利人之所驚，生人之所食，乃能不奪于利、不吝于死，籌以從容，出以慷慨，微斯人吾誰與歸？

此處標點不夠精細，使文義不能顯豁。“利”字下應加一逗號，“驚”字下逗號宜改為分號，“生”字下應加一逗號，“食”字下逗號宜改為句號。“不奪于利”後頓號可改逗號，“慨”字下逗號宜改句號。“人”字下應加一逗號。改正後的文字標點如下：

草莽臣曰：利，人之所驚；生，人之所食。乃能不奪于利，不吝于死，籌以從容，出以慷慨。微斯人，吾誰與歸？

第 38 頁倒第 6 行

（掌珠）道：“自己出頭露面辛苦，又要撐店，又要服事婆婆。生意他去做着，就把人趕走了，虧我兜收得來。”又十主九憎嫌，氣苦萬狀。

按，“又十主九憎嫌”也是掌珠告狀的話，是承接“虧我兜收得來”而言的。“主”是指店中買主，憎嫌是婆婆憎嫌。婆婆做生意把人趕走了，我兜攬回來，她又十個嫌九個不好。只有“氣苦萬狀”才是說話人描繪掌珠的。因此，“來”字下句號應改為逗號，“又十主九憎嫌”應移入引號內，“嫌”字下逗號相應改為句號。

第 52 頁第 1 行

又有一種迂腐的，倒說道：“割股虧親之體，不知若能全親之生，雖虧也與全無異。”

按，這裡是說“割股虧親之體”是一種迂腐的意見。“不知”以下二句是說話人駁斥這種迂腐之見的。因此，句中的冒號與引號均應去掉。

第 63 頁第五回回首小叙第 2 行

使耿墮不斷，安知愛欲日深，身為情使，刃淫之刃，不轉為淫用乎？人且謂其不絕之，而必刃之為忍。不認于未成獄之時，認于既成獄之後，亦為怯。噫，何其繩人無已也。

按，第 2 個“刃”字下的逗號宜去掉。“絕之”下的逗號也應去